

抗战时期史论选

陈廷湘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抗战时期史论选/陈廷湘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9.2

ISBN 978原原20原1144原

I. ①抗… II. ①陈… III. ①抗日战争—文化史—研究
—中国 IV. ①K265.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73680 号

KANGZHAN SHIQI SHILUNXUAN

抗战时期史论选

陈廷湘 著

策划组稿	周 颖
责任编辑	吴焕姣 杨雨霏 王 莹
封面设计	陆红强
版式设计	戴雨虹
责任校对	吴 玥
责任印制	王 俊
出版发行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http://www.scpph.com
E-mail	scrmcbs@sina.com
新浪微博	@四川人民出版社
微信公众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发行部业务电话	(028) 86259624 86259453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 86259624
照 排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伊40mm
印 张	13
字 数	210 千
版 次	2019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原原20原1144原
定 价	58.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028) 86259453

前 言

本书是笔者研究抗日战争时期历史的论文选。为学数十年来，笔者对抗战时期的历史有较广泛的涉猎。诸如抗战时期的政治、思想、学运、社会、兵役、战争、抗日根据地民众动员、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卫生等均有一些文章发表。本书未将全部论文编入，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其一，笔者治史崇尚“才学识”兼备之道，每为一文均图持见新异，如自觉无较重要的新问题不作为高。本论域的研究成果一部分主要为阐述个人见解之作，“史意”与存史并重；另一部分主要梳理史实，呈现某一历史事件的发生演变进程，存史为主，“史意”次之。本书选文依上述原则为准，主要将阐述个人见解之作收入，集中提供给读者批评。其中一些篇目批判意味浓厚，曾引起争议，此次收入，望得到更多批评。其二，本书所选论文篇幅较大，仅选入八篇 20 余万字，已可足成一书。

本书所选的一些篇目如《论抗战时期的民族主义思想》《论抗战时期国民党的政制建设》是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之作。历史哲学家科林武德说，任何历史研究都是历史学家当时的思想（原始思想）与历史资料结合产生的“次生思想”。一个时代的历史研究成果是该时代学者的“次生思想”，它不一定是正确的结论，但它是时代的思想印记。当代中国处于急剧变革时期，历史学者的认识也变化急剧。把 20 多年前的一些著述收入本书，目的不在于展示成果，而是把逝去年代本人历史认知的“次生思想”呈现于世，给读者提供窥探那个时期历史思想样态的一些资料。

不当之处，恭请读者批评。

作 者

2018 年 3 月 16 日

目 录

前 言	(001)
论抗战时期的民族主义思想	(001)
七七事变前国人对中苏关系认识的演变	(021)
中国反法西斯战争对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	(045)
日本对一战后世界秩序的挑战与失败	(060)
论抗战时期国民党的政制建设	(075)
战时特殊利益空间中的国家、基层与民众	(100)
九一八事变后学生请愿示威运动的特殊样态及成因	(120)
重评淞沪会战的战略意义	(164)
后 记	(200)

论抗战时期的民族主义思想

日本军国主义从九一八事变入侵东北开始，一步步把中华民族逼进了民族危机的深渊，民族主义也就愈益成为民族向心力的源泉，曾因此造成了各种互相纷争角逐的政治力量汇合于抗日统一战线之下共赴国难的局面。在这一背景下，众多政治家和文化人迅速把视线集中于民族主义的讨论。谈民族主义成为一时的主流思潮。从各种不同背景的思想者的民族主义言论中，可以看出他们希图实现的目标基本一致，皆为抵抗日本侵略，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主义目标的思想路径亦大体同旨，均具通过复兴民族文化以加强民族自信心，实现民族复兴的明确意向。但是，在如何选择民族文化复兴路径的问题上，民族主义者各派之间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与分歧，然差异显明的思想路径的最终归宿又颇为趋同。

（一）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不是把国家遭受侵略的原因归结为社会经济发展的落后和不发达，而是归结为民族固有文化精神的丧失。他说“凡是一个民族，能够立在这个世界上，到几千年不被人灭亡，这个民族一定有其立国精神的所在”，设若“没有民族精神”，国家必被外敌侵略甚至走上亡国之途，“陷于不可救的绝境”。他强调指出，近代以来，由于受了西方文化的冲击与影响，“由个人道德的堕落，影响到全民道德的堕落，必然使国家社会所赖以生

存的东西——民族精神——民族道德，完全崩坏”^①。由于“一般人不讲究固有的道德，视为陈腐的东西”，“所以几十年来弄得人欲横流、（礼、义、廉、耻）四维灭绝”，造成了“今日禽兽般的世界”，“如此国家，当然要被外国人侵略压迫”。^②因此，“如不赶快恢复我们固有民族性，把我们中华民族数千年的立国精神复兴起来，而仅是注重物质”，中国社会赖以生存的“民族精神”“完全崩坏”，就会导致“国家民族于灭亡”。^③蒋介石提出，要“复兴民族”“复兴国家”，就“必先恢复民族固有道德”^④，“就先要恢复中国固有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民族道德”^⑤。他断言：只要中国人民“绝对信赖民族文化之博大”，“则民族精神，沛然发动，何功不立，何敌不摧”。^⑥

在这种思想观念的支配下，国民党中央及一些地方当局都恢复了早已经为新文化运动所批判的尊孔读经。^⑦1933年，蒋介石提倡并号令部下尊孔读经。他认为，“四书”是“伦理政治与军事之基本哲学”，“如能精研力行，必可完成御侮复兴之大业”^⑧。并将“四书、五经”规定为国军官兵的必读书，还利用各种场合与时机，不厌其烦地为部下讲经，尤其是详尽讲解《大学》《中庸》，号召部下学习曾国藩等“保卫文化，扶持名教”的精神，以“继承与护卫”“中国的纲常伦理、民族传统（道统）”为己任。1933年和1934年，

① 蒋介石：《革命哲学的重要》，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3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86—587页。

② 蒋介石：《军队教育的要旨》，1934年9月10日，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3卷《讲演》，（台）“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年，第470—471页。

③ 蒋介石：《革命哲学的重要》，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3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86—587页。

④ 蒋介石：《民族复兴之路——民国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在军校京沪江苏学生训练总队总理纪念周讲》，《蒋总统集》第1册。

⑤ 蒋介石：《革命哲学的重要》，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3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87页。

⑥ 蒋介石：《抗战建国三周年纪念告全党同志书》，1940年7月7日，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1卷《书告》，（台）“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年，第178页。

⑦ 近年来关于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当局尊孔读经的相关研究，主要有：罗玉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湖南尊孔读经之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尤小立：《“读经”讨论的思想史研究——以1935年〈教育杂志〉关于“读经”问题的讨论为例》，《安徽史学》2003年第5期；赵美玉：《20世纪30年代反击尊孔读经复古逆流》，《哈尔滨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罗玉明、陈新征：《蒋介石与20世纪30年代的读经运动》，《怀化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袁咏红：《20世纪30年代“读经”的主张和争论》，《史学月刊》2008年第7期。兹不详细赘述。

⑧ 蒋介石：《御侮与复兴之基本要道》，1936年1月25日，《蒋总统集》第1册，第22页。

统治广东的陈济棠和统治湖南的何健也相继下令粤、湘两省中小学校开设读经课程。1934年至1936年期间，统治河北、察哈尔两省的西北军将领宋哲元亦积极提倡读经，他下令设立了河北莲池讲学院，发布多个“通令”，要求“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垂为信条”，并在机关、部队中开展读经活动，“特聘请前清翰林、汉学家梁式堂为省府顾问”，“为众人讲经”。讲经时，“省府大礼堂红烛高烧，气氛肃穆，讲师高坐首席，省府各厅处局长，驻军团长以上官长，皆环坐听讲，宋哲元本人也安坐师右，持书静听。读经遂蔚然成风”^①。在这样的尊孔读经之文化复古氛围下，1934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明定孔子生日为国定纪念日，“通令全国恢复纪念孔子诞辰并颁布种种礼节”，要求全国各地于8月27日“举行孔子诞辰纪念典礼”，“曲阜祀孔”得有中央特派员出席，并发布了“重修孔庙，优待圣裔等”命令。^②同年12月，国民党中央又通过“尊孔祀圣”决议，各地学校规定必须读经，以陶融青少年儿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道德情操。

与此同时，国民党还在社会基层领域发起“新生活运动”。该运动以“礼、义、廉、耻”这“四维”作为运动的“核心准则”，期望通过运动使全国人民养成“规规矩矩的态度”“正正当当的行为”“清清白白的辨别”“切切实实的觉悟”，^③做到生活“军事化”“艺术化”“生产化”。^④对于新生活运动，蒋介石强调其目的就是要使“全国同胞”，都能恢复“中华民族固有的道德精神”^⑤，以发扬民族精神，增进国民道德，“改善国民的精神生活，完成国家的精神建设”。^⑥时任新生活运动总干事的贺衷寒则更加明确地说出了新生活运动的反对新文化运动之立场与性质。他说，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倡言“思想解放”，导致邪说“乘机而入”，致使“国民之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均“陷入危机”。新生活运动的宗旨就是“纠正”新文化运动所造成的“偏差”，

① 山东省乐陵市文史资料委员会：《宋哲元》，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21页。

② 《教育杂志》第25卷第5号，1935年5月20日，上海商务印书馆，第75页。

③ 蒋介石：《新生活运动纲要》，张其昀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3册，第3129页。

④ 蒋介石：《新生活运动纲要》，张其昀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3册，第3131页。

⑤ 蒋介石：《二十五年元旦告全国军民同胞书——国民自救救国之要道》，张其昀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3册，第3150页。

⑥ 蒋介石：《二十五年元旦告全国军民同胞书——国民自救救国之要道》，张其昀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3册，第3151页。

“就是要把‘五四’的新文化运动的破坏运动，改变成一个建设运动”，“把中国固有的精华加以发扬”。^①由此可见，蒋介石等把中国遭受日本侵略的深层原因归结为民族文化精神的丧失，并把复兴传统文化作为民族复兴的根本大计，显然顺理成章。

现代新儒学的早期理论家梁漱溟等人的民族主义思想，与蒋介石上述意向基本一致。在论及中国面临的险恶危机时，梁漱溟把传统文化的破坏对民族生存地位的影响看得更为严重。他认为：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只是破坏中国民族独立的一种外力，无伤其根，而近代以至五四以来，“对固有文化之厌弃反抗”则是内部“自觉地破坏”。而这种“自力破坏”“是破坏力中之最强者”，“是中国社会崩溃的真因”，^②挽救中华民族必须从乡村做起，彻底恢复中国固有文化精神。概而言之，就是要“以乡村为根，以老道理为根”，“开出新道路，救活老民族”^③。贺麟也认为，“儒家思想的命运，与民族前途的命运，盛衰消长，是同一而不可分的”。当时争取民族复兴，不仅是“争抗战胜利”，更重要的是图“民族文化的复兴”，因为“民族复兴本质上”就是“民族文化的复兴，儒家文化的复兴”。^④

对复兴传统文化以复兴民族之路，当时的钱穆怀有更热切的希望。他认为近代以来，中国人“以其急功近利之浅薄观念，自促其传统文化之崩溃”，“直至于今”，终于弄得“非驴非马，不中不西……病痛百出”；中国欲求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不再受欺辱，必须“重回头来再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之真价值”；只要中国文化发扬光大，与西方文化“互相辉映”，就不但能使中华复兴，且能“使人类在惊涛骇浪中，重得靠岸”。钱穆对其所期深信不疑。在民族遭受日本侵犯之际，不直言抗敌而不厌其烦地阐论文化复兴，他对此解释说：“我侪在此全世界战云笼罩之际，而发心为东西之再探讨，其事虽迂，其愿实宏。”^⑤他欲复兴文化以复兴民族的愿望不只是真诚的，也是强烈的。

儒家文化产生在中国封闭时代，并无针对外来侵略的内容，“天下大同”

① 贺衷寒：《新生活运动之意义》，《新生活月刊》创刊号，1934年10月。

② 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00—201页。

③ 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14页。

④ 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4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11—624页。

⑤ 钱穆：《东西文化之再探讨》，《华西大学华文月刊》第1卷第2期。

是其根深蒂固的传统精神，要从儒学经典中直接寻出民族主义的教诲是不可能的。因此，抗战时期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实际都是借助儒家集体主义号召团结，聚合民气，共赴国难。作为国民党当权者的蒋介石则不仅要以儒家集体主义聚合抗日力量，还要趁国难当头、民族一致对外情绪激越之机，以传统集体主义号令天下，取得建立高度集权统治的合理性。九一八事变后，蒋即大声疾呼，中国当务之急是“团结内部”“抵御外侮”。要完成这一使命，每个人都必须“要有成仁取义的精神，为国家为民族而牺牲个人的一切幸福”。^①全面抗战爆发以后，蒋更一再强调要“打倒个人主义”，“使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人人……牺牲小我，舍己利群”，“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只知有公，不知有私”。他要求人们把“国家政府的命令，作为个人自主自动的意志”，把“国家民族的要求”，作为“个人自主自动的要求”。广泛灌输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思想。这与复兴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以实现民族复兴之义存在一定的逻辑错位。

（二）

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扩大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日益逼近，中国国家主义派的思想发生了向极端民族主义的转化。民族主义思想暂时离开以儒家为主流的传统文化。

1936年，国家主义者陈启天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之际，提出了“新战国时代”理论。他说，世界进入近代以后，“国家的特点，在对内方面是实行法治的民主主义，以求统一；在对外方面，是实行民族的国家主义，以求发展；在物质方面，是采用科学的物质文明，以求便利；在精神方面，是信仰斗争的进化学说，以求胜利”。而建立在这些特点之上的“近代国家之国际关系，是各求发展，互相斗争”。这就是“新战国时代”的国家关系。^②陈氏认为，世界的近代就是“新战国时代”。在新战国时代，“自然而然要重行倾向于法家思想”，而“最有力的思想”就是“国家观念”“法治观念”“军国观念”和“国家经济观念”等。因此，西方的“法治学说，军国主义，民族国家主义”

^① 《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四中全会开幕式演说》，《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

^② 陈启天：《中国法家概论》，中华书局，1936年，第110页。

都有“复盛的倾向”^①。陈启天认为，这些西方思想与中国古代法家思想有“几分相似之处”，与中国以中庸为本的儒家思想则针锋相对。他说，“滋长在闭关的大一统帝国之内的儒家思想”，完全不符合“新战国时代的需要”^②，中国必须“将旧法家思想中之可以适用于现代中国的成分，酌量参合近代世界关于民主、法治、军国、国家、经济统治等类思想，并审合中国的内外形势，以构成一种新法家的理论”。并断言“这种新法家的理论成功之日，便是中国得救之时”^③。此时的国家主义派已经在“新战国时代”理论之下，完全抛弃了在20世纪20年代竭力避免中国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思想，在理论上由复兴儒家文化走向了反儒家文化，以强烈的民族排他意向取代了民族平等相处的观念。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高潮时期，中国的民族主义在上述国家主义派的理论基石上，进而演变成了“战国策派”的政治主张。1940年至1942年间，林同济、陈铨、何永佶、雷海宗等一批知识分子先后在昆明创办《战国策》半月刊，在重庆《大公报》下办《战国》副刊，形成了史称“战国策派”或“战国派”的民族主义思想派别。战国策派较为系统地向国人译介了德国哲学家尼采、斯宾格勒的“超人哲学”“唯意志论”“文化形态学”等哲学思想，他们宣传“大战国时期”理论，宣扬“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道德观和“英雄崇拜”理论，并为蒋介石及国民党当局的独裁辩护。

1. “大战国时期”理论

雷海宗、林同济两人是“战国策派”的主将，也是“大战国时期”理论的主要构造者和积极宣扬者。他们运用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提出的“文化形态学”^④，考察中外历史上文化现象后提出，世界各国凡是“历史上自成体系的文化，只须有机会充分发展，不致中途被外力摧残而夭折者，都要经

① 陈启天：《中国法家概论》，中华书局，1936年，第115页。

② 陈启天：《中国法家概论》，中华书局，1936年，第115页。

③ 陈启天：《中国法家概论》，中华书局，1936年，第120页。

④ “文化形态学”，亦称为“文明形态史观”，是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亦译作“施本格勒”）在其名著《西方的没落》中提出的一种历史哲学或历史观。这种历史哲学或历史观以文化作为历史研究的单位；主张文化是具有生、长、盛、衰等阶段的有机体；世界历史不过是各文化的集体记忆；各种文化都要遵循同样的轨道，经历前文化阶段、文化阶段和文明阶段；等等。详见[德]施本格勒著，齐世荣等译：《西方的没落》，商务印书馆，1963年。

过一个‘战国时期’”，“都各有各的战国一段落”^①。他们认为，在中国古代史上，只有“战国时期”的中国才是最富有生气的，可惜的是，秦汉以后的中国文化则演变成为一种“无兵的文化”，其主要特征就是“没有真正的兵，也就是说没有国民，也就是说没有政治生活”。在这样“无兵的文化”环境下，中国人就再也没有斗志，精神萎靡，朝政腐败，历史亦因而成为“静的历史”，“只有治乱骚动，没有本质的变化”，“轮回式的政治史一幕一幕的更迭排演，演来演去总是同一出戏，大致可说是汉史的循环发展”。^②从历史的发展是循环的这一思想认识出发，林同济等人主张，现在又正是“世界史上的‘战国时代’”^③。“乃是又一度‘战国时代’的来临！”^④他们认为，现在这个“大战国时期”完全是欧洲文化发展的结果。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地理发现、工业革命”，欧洲文化已经成为“现代全世界文明的动力，并且决定了现代世界史—人类第一次真正的‘世界史’的发展模型与方式”。这种现代“世界文明，是充满着所谓‘浮士德的精神’的”，它有“一种无穷的膨胀力，无穷的追求欲”。在这种现代文明之下，世界经过“十六、十七、十八三世纪”的发展，到拿破仑时代开始进入了“战国时期”。因此，中华民族的“时辰八字，不是平凡，乃恰恰当着世界史上‘大战国时期’露骨表演的日子”^⑤。

战国策派把中国古代史上的战国时期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背景下的所谓“大战国时期”混为一谈，反复强调“大战国时期”的时代意义就是一个“战”字。林同济阐释说，“战国时代的意义，是战的一个字，加紧地、无情地、发泄其威力，扩大其作用”。他提出，“大战国时期”及其“战”，主要特点有三：

其一，“战为中心”。林同济认为，“大战国时期”所谓的“战为中心”者，即“战不但要成为那个时代最显著重要的事实，而且要积极地成为一切主要的社会行动的标准”和“一切行动的大前提”。他强调，在“大战国时

① 林同济：《战国时代的重演》，《战国策》1941年第1卷第1期。

② 雷海宗：《无兵的文化》，《社会科学》第1卷第4期，1936年7月。

③ 林同济：《战国时代的重演》，《战国策》1941年第1卷第1期。

④ 林同济：《战国时代的重演》，《战国策》1941年第1卷第1期。

⑤ 林同济：《战国时代的重演》，《战国策》1941年第1卷第1期。

期”“战为中心”的形势下，“战”将成为“社会上一切”的存在“根据”。“信仰、企业、社会改造等大事情”都要随战而转移，失去“独立发展的自主权”；战的威力却要“加紧地、加速地取得主动的地位”，成为“其他一切”决定因素。^①

其二，“战成全体”。林同济指出：“战国时代，战乃显著地向着‘全体化’一条路展进”，战国时代的国家必“人人皆兵，物物成械”。“有本领随时可作全体战，可作‘战国之战’”，既“是任何民族的至上需求”，也是民族存在发展的“先决条件”。在这种“一切为战，一切皆战”的全体战的形势下，民主问题将退居于次要位置。^②

其三，“战在歼灭”。即战争的目的不是为“胜利”，而是“非到敌国力全部消灭不止”。战国策派指出，战争可分为“取胜之战”和“消灭之战”两种。前者最多不过是赔款割地，后者则“不在割地，不在赔款，而在根本毁灭对方”，^③必须拼出你个死我活的结果，“非到敌国力全部消灭不止”，因而也就“无和可言”。^④他认为，“大战国时期”的战争，就是这种以“根本毁灭对方”为目的的消灭战。各国都期望通过这样的歼灭战，消灭对手，以自己为中心建立起“全世界的‘大一统’”。^⑤林同济宣称，在“大战国时期”这种“根本无和”的消灭战的世界形势下，“和便是全体投降，男为臣，女为妾”。“再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躲避歼灭战的尝试”。“在这种情形下，小国弱国没有幸存的余地，即使幸存”，也“对当时的大政治”，“没有过问的资格，危坐在火山边际，永远战战兢兢，到了最后一刻，人家挥刀”，“只有引颈就戮而已”。^⑥

在林同济看来，“大战国时期”，既是一个“无情的时代，充满了杀伐残忍之风”，“却也是伟大的时代，布遍着惊人的可能”，“惟其无情，所以伟大。惟其伟大，所以无情”。他进而指出，当时正在激烈进行的中日之战，就是中

① 林同济：《战国时代的重演》，《战国策》1941年第1卷第1期。

② 林同济：《战国时代的重演》，《战国策》1941年第1卷第1期。

③ 何永佶：《政治观：外向与内向》，高军等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55页。

④ 林同济：《战国时代的重演》，《战国策》1941年第1卷第1期。

⑤ 林同济：《战国时代的重演》，《战国策》1941年第1卷第1期。

⑥ 林同济：《战国时代的重演》，《战国策》1941年第1卷第1期。

日两国之间一场决定国家、民族命运的你死我活的“消灭战”，并且强调说：“人类的大运所趋，竟已借手于日本的蛮横行为来迫着我们中国人作最后的决定——不能伟大，便是灭亡。”既然日本对我们中国是非消灭不可，我们也就只有坚决抗战到底，再没有别的出路，“更不得再抱着中庸情态”，试图继续过“那不强不弱不文不武的偷懒国家的生涯”。他说：并不是所有人都形成了战国时代的意识，仍“有一辈惯为臣妾之徒，以为天地间总有侥幸可图，只须号泣走敌廷，三跪九叩，人家即可‘放松’饶命。傀儡心理，文人政客鬼胎，真贱极无聊了！”^①

战国策派关于“大战国时期”及其“战”的这些理论言说，从一般理论形态上看，似乎进一步背离了中国传统文化，把国家主义派的民族排他思想发展成了强烈的对外扩张观念（实质上并非如此），其间虽不乏偏颇谬误之处，但他们说明了在当时抗日战争的严峻形势下，中国必须用武力彻底战胜日本侵略者，不战就不能生存的道理，对鼓舞中国人民坚持抗战、反对投降、争取胜利的信心、斗志和勇气无疑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战国策派在理论上持民族扩张观点，自然要进一步走向反对中国儒家文化的途径，而提倡其所谓“力的宇宙观”和“力的哲学”。按照他们的解释，“力者非他，乃一切生命的表征，一切生物的本体。力即是生，生即是力”^②，“一切创造只是‘力’的表现，活力的‘自成’”^③。西方列强所以强盛，就在于它们有“力的政治”“力的文化”。处在“大战国时期”的中国，同样也应当需要“力的宇宙观”及“力的政治”“力的文化”。^④他们阐释说，在“大战国时期”，国家乃是“在战争中及为战争而存在”的。“国与国的关系”，也“完全变为‘力’与‘力’的关系”。国际交往之道也都是凭实力说话，“惟有力量相等的始配谈公道，力量强大的可任作任为，力量微弱的必须听命俯首”^⑤。这种“有力即有理”的国际形势，客观上要求中华民族放弃儒家传统的“唯德主义宇宙观”和“德感主义”的道德观，改而提倡和崇奉“力的宇

① 林同济：《战国时代的重演》，《战国策》1941年第1卷第1期。

② 林同济：《力》，《战国策》1940年第3期。

③ 林同济：《力》，《战国策》1940年第3期。

④ 林同济：《力》，《战国策》1940年第3期。

⑤ 何永佶：《论国力政治》，《战国策》1941年第2卷第13期。

宙观”与“力”的哲学。林同济说，中国的儒家文化中有着一套“德感主义”的政治观、历史观以及一个作为其最后根据的“唯德主义宇宙观”。在“唯德主义宇宙观”的影响下，中国人“极力恭维以‘德’（服人）手段的高明”，不仅主张“以德感人”，并相信“德‘必定’感人”，进而认为“宇宙间一切事物的本质都是‘德’的，一切事物彼此间的联系也是‘德’的”，“整个宇宙的结构与运行，既然全靠‘德’来维持，则‘力’之一物，根本无地位”。^①但由于在“大战国时期”，现实世界充满了“非道德”“非经济”的冲动和“无穷的追求欲”，^②中国若仍以“唯德主义宇宙观”及儒家的“中庸为教”，就将失去立足的基地。如果人们的“道德头脑太注重”“主观的价值”，则势必“要向‘反现实’的路径上走”。他批评“儒家的德感主义就是这个反现实的道德头脑的表现”，它“无形中把中国的思维术永远地局限在主观价值论的范畴里而不使踏进”“客观的科学境地”，并进而指出，这种儒家德感主义是面临“大战国时期”的中华民族所不需要的，因为现代世界奉行的是与“德感主义”完全针锋相对的“力的宇宙观”。^③他断言：“一个民族不了解，甚至于曲解误解‘力’字的意义，终必要走上堕萎自戕的路程；一个文化把‘力’字顽固地看作仇物，看作罪恶，必定要凌迟丧亡。”^④战国策派另一人物何永佶也强调倡行“力的哲学”的现实意义，说：“惟其讲力，故具有深强意识之政府，必奖励科学，以增强国家的战斗力”^⑤。

出于上述认识，战国策派提出了关于国内政治的三点主张：第一，“领袖集权”和“行政集权”。在“领袖集权”上，他们选择了蒋介石，把抗战建国、澄清吏治的希望寄托在蒋氏的身上，称赞蒋为“稀世的领袖”，“不但是个当代规模军人，而且是个有卓识有魄力的政治家”。^⑥在“行政集权”上，

① 林同济：《力》，《战国策》1940年第3期。

② 林同济：《战国时代的重演》，《战国策》1941年第1卷第1期。

③ 林同济：《力》，《战国策》1940年第3期。

④ 林同济：《力》，《战国策》1940年第3期。

⑤ 何永佶：《政治观：外向与内向》，高军等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59页。

⑥ 王赣愚：《关于我们的战时行政》，《战国》第15期，重庆《大公报》1942年3月11日，第一张第四版。

他们强调“政权之统一化，吏治之效率化”^①，期望通过“进一步促进‘行政集权’，以便‘领袖集权’可充分发挥其效力”。^②第二，“军队国家化”。战国策派提出，要“注重国防，集全国一切的力量以向外方”，就必须实行“国内之军队国家化”。他们“认定国家为世界大政治中角逐之一员，在那无情的角逐中，不容许我们割据自私”。他们强调，只有在实行了军队国家化的基础上，宪政、法治等民主政治问题才有可能提上议程，“惟其军队国家化，始有宪政可谈，始有法治可讲，军队而不国家化，则朝立宪法，而暮即可毁坏”。^③第三，政府应高度重视科学在增强国力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战国策派提出，“科学不仅是一种‘机械力’，乃更是一种莫大的‘政治力’”。^④“惟其讲力，故具有深强意识之政府，必奖励科学，以增强国家的战斗力”。^⑤

总之，在战国策派看来，中华民族只有放弃“德感主义”转而提倡、奉行“力的哲学”，依靠这种“力”的膨胀与冲动，方能应付“大战国时期”的局面。战国策派这种绝对崇尚客观物力而极端否定道德价值的思想，显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各国较量国力这一现实的反映，也是中国旧文化在现代世界找不到出路的歪曲反映。把尚力与尚德绝对地对立起来无疑是一种偏见，但它要求给民族文化加入阳刚之气，在新的环境下摆脱伦理至上、中庸和平的传统伦理道德及其束缚，以积极上进的姿态跻身于世界竞争的行列，在观念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2. “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道德观

战国策派同样高扬“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旗帜，并将其作为政治道德之最高原则而更加以绝对化的解释。他们宣称：“‘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原来并不只是一种抗战期内的口号，乃是一种世界时代精神的回音。”^⑥他们

① 何永佶：《政治观：外向与内向》，高军等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57页。

② 王赣愚：《关于我们的战时行政》，《战国》第15期，重庆《大公报》1942年3月11日，第一张第四版。

③ 何永佶：《政治观：外向与内向》，高军等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59—760页。

④ 公孙震：《知与力》，《战国》第3期，重庆《大公报》1941年12月17日，第一张第四版。

⑤ 何永佶：《政治观：外向与内向》，高军等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59页。

⑥ 林同济：《第三期的中国学术思潮——新阶段的展望》，《战国策》1941年第2卷第14期。

阐释说，战国时代之战是以国作为基本的单位，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等一切社会活动，都必须以“国”之存亡为根本的目的。战国时代的国家，就是“一切人群结合中唯一具有‘作战权’的团体，有此则成国，无此则非国”。^①“在世界没有大同，国际间没有制裁以前，国家民族是生存竞争唯一的团体”。^②

根据这种“大战国时期”国家理论以及对时代特点的分析，战国策派把否定个体价值，提倡“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道德原则进一步推向了极端，从反儒家德感主义进而提出反五四精神的主张。他们强调：“大战国时代……比任何时代都要绝对地以‘国’为单位，不容局限于个人与阶级，而也不容轻易扩大而多言天下一体。”^③在国家之内“不能有个人硬挺挺自在自由，也不能有阶级之乱纷纷争权夺利”^④。出于这一认识，陈铨指责五四运动提倡“个人主义”“理智主义”，是“没有看清时代，在民族主义高涨之下，他们不提倡战争意识，集体主义，感情和意志，反而提倡一些相反的理论，使中华民族在千钧一发之际，没有急起直追，埋头苦干”，导致“惊涛忽至，举国仓皇”的危势。^⑤林同济则要求必须对五四精神进行一次大转变。他阐释说：“‘八一三’抗战展开以来，集体生命，民族安全感觉”已经成为“思想界的主题”。在此形势下，五四精神已经过时，“五四的作风必须向另一路线转换”，即从“个性解放的要求一变而为集体生命的保障”。这一“转变”的具体内容与大致路径是：其一，从个体“自由”的追求转向对国家、社会的“皈依”，即以个人的存在“皈依于更大于我者而存在”，从而取得个体“存在的意义与价值”。换句话说，就是要个人完全放弃自由与意志，从存在上把自己融化于他们所主张的“至上”的国家、民族之中。其二，放弃个人“权利”思想而树立“义务人生观”。即要求放弃“人权思想”而树立“义务人生观”，

① 何永佶：《政治观：外向与内向》，高军等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53页。

② 陈铨：《政治理想与理想政治》，《战国》第9期，重庆《大公报》1942年1月28日，第一张第四版。

③ 林同济：《柯伯尼宇宙观——欧洲人的时代精神》，温儒敏、丁晓萍编：《时代之波——战国策派文化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第219页。

④ 林同济：《第三期的中国学术思潮——新阶段的展望》，《战国策》1941年第2卷第14期。

⑤ 陈铨：《五四运动与狂飙运动》，温儒敏、丁晓萍编：《时代之波——战国策派文化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第348页。

以社会的需要与集体的存在为个人存在价值的“前提”和归宿。其三，从追求“平等”转向追求为国家发挥自己“特能特有的功用”。即强调人生的目的不在于追求人权平等，而在于“每一个人可以有他的相当机会来达到他所特能特有的功用”，并按照“人人得其用”，而不是“一切皆平等”的模式，来建构“合理而得力的社会”。其四，从“浪漫”的理想转向“现实”的实行。即一反五四时期追求理想的热望，人人作一个没有思想，只知听从驱使而行动的机械。其五，“从理智到意志”。即改变五四的科学理性的思维及认识原则与受规律支配的人生，提倡服从意志支配理智的人生。林同济甚至说：“有物质无意志，根本无力；有意志无物质，还有办法。”把意志看成可以超越客观规律，可以产生物质的力量。^①

在这里，战国策派已由国家主义派一般性地轻视个性解放进而发展为根本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精神。他们宣告新文化运动大张旗鼓倡导的自由、民主、平等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要求“五四的作风必须向另一路线转换”，以便创造出一个以提倡“民族的集体认识”为基本精神的“第二度新文化运动”。^②这事实上是彻底否定以科学民主、个性解放为主要内容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3. “唯意志论”和“英雄崇拜”论

为进一步给“国家至上”的“集体认识”建构理论基础，战国策派还竭力倡言“唯意志论”与“英雄崇拜”理论。他们视人类意志为历史演进的中心，将人类的生存意志称为“推动人类行为最伟大的力量”。陈铨说：“物质的力量，决不是万能，人类的力量也不是万能，但是人类意志发展努力的过程，的确创造了人类全部的历史。”^③他认为：“人类之所以为人类，除掉饥餐渴饮穿衣生育以外，还有其他强烈的‘意志’。这一种与生俱来的不可磨灭的意志，就是人类精神活动的根基，就是人类一切感觉本能统一性的主脑。”^④

① 林同济：《廿年来中国思想的转变》，《战国策》1941年第2卷第17期。林氏此处共论述了“从自由到皈依”“从权利到义务”“从平等到功用”“从幻想到现实”“从理论到行动”“从公理到自立”“从理智到意志”七方面的内容。笔者根据本书主旨，仅从中选取了五个要点略做简述。未尽之意，请阅读原文。

② 林同济：《廿年来中国思想的转变》，《战国策》1941年第2卷第17期。

③ 陈铨：《论英雄崇拜》，《战国策》1940年第4期。

④ 陈铨：《论英雄崇拜》，《战国策》1940年第4期。